

注：这是一篇学术论文，虽然不长，但有些地方同学们可能会觉得读起来“吃力”，如果感到吃力，可以直接阅读老师给大家用“红框”框定的部分。当然，感兴趣的同学建议阅读全文！

襄助北魏孝文帝迁都的三位关键人物^{*}

李 凭

内容提要 北魏孝文帝南迁国都，工程浩大而繁杂，因得力于尚书李冲、任城王拓跋澄和皇后冯氏的襄助，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大业。李冲、拓跋澄和冯氏分别是汉族士族、拓跋宗室和皇室中最有权势和能力的人物，他们在营构新都、动员与组织迁徙的活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不过，他们对于孝文帝的迁都方略，或者事先并不知情，或者知情之后一度激烈反对。然而，孝文帝却坚定地重用他们，这与孝文帝欲藉迁都事件而达到分化平城旧政治集团之目的密切相关。

关键词 北魏 孝文帝 迁都 关键人物

北魏孝文帝将国都从平城南迁到洛阳，不仅是北魏政治史上的特大事件，而且是中国历史上关乎民族融合潮流、文化交流趋势以及经济发展走向的重大事件。这次迁都事件，从太和十七年（493）十月孝文帝下诏营建新都起，至太和十九年（495）九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止，历时仅仅两年就完成大业，不能不说是历史上的奇迹。

都城的迁移是浩大而繁杂的工程，不仅关系到北魏政权的得与失，而且牵涉到北魏统治下的社会各阶层的利与害。作为这次迁都运动最高领导者的孝文帝，虽然从文明太皇太后冯氏手中接管了经营将近百年的稳固江山和繁荣局面，但是也面临着诸多新旧矛盾，预感到种种潜在危机。然而，他不惧艰难险阻，缜密思虑规划，终于实现目标。迁都的成功，不仅是孝文帝决心坚定和谋略正确的结果，而且与他善于使用关键性人物密切相关。

三方面的关键人物

北魏迁都事件是学术界讨论已久的问题。特

别是，自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由于孝文帝是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因此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是，也正是囿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使得人们考察的视角更多地注重于迁都事件的原因、过程、影响等普遍意义上的讨论^①。关于其中的人事问题，虽然也无可避免地屡有涉及，不过仍然具有进一步作细致研究的必要。

从已有的史料来看，在北魏的朝廷与宫廷之中，真正自始至终支持孝文帝迁都者只是少数人，而且他们的表现并不明显。台湾史学家逯耀东先生的专著《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②中有三篇文章着重探讨北魏迁都的问题。他在《北魏孝文帝迁都与其家庭悲剧》^③一文指出：“孝文帝决定定都洛阳的计划，是很突然而机密的，甚至于连当时被视为左右手的元澄、李冲事先都不知道，所以，定都洛阳与全身披挂准备发兵南征策略的制定，很显然出于另外一批人之手，后来张彝、郭祚、崔光都因‘以参迁都之谋’而进爵。这幕戏剧性的演出，很可能是由他们在幕后制作

^{*} 本文系广东省社科基金项目“北魏洛阳政权研究”（项目号：06103）的阶段成果。

的。同时,也可以证明孝文帝的迁都计划不仅在平城,受到保守势力坚决的反对,即使离开平城到洛阳以后,仍然不能获得全体的支持……”逯耀东先生的论述是深刻的。孝文帝迁都的想法可能在心中思谋已久,但是具体的计划只能在文明太皇太后去世以后盘算,因为这一举动与文明太皇太后生前的执政方略是违背的。文明太皇太后生前绝不会有迁都的念头,我们只需从她将自己的陵墓建在平城北郊方山之上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文明太皇太后死于太和十四年(490)九月,与太和十七年十月孝文帝发布迁都诏书之时仅仅相隔三年。短短的三年之间,竟然要在关于国都的位置这样重大问题的方略上作出根本性的变革,确实显得极为仓促,必然给人以“突然而机密”的感觉。

为了尽可能地减少阻力,孝文帝最初只能与张彝、郭祚、崔光这班人在暗处谋划。至于张彝等人,当然不敢在朝廷公开张扬迁都之举,因为当时他们还不是北魏朝廷中的权势显赫者。然而,迁都是牵动国家政治与民生经济的大事业,不能总停留在暗中谋划,最终是要大张旗鼓地操作实施的。这项复杂的工程包含三个重要的环节:首先,要在新都开展大规模的土木建设,以备宫廷和政府机构的资产以及民间物资的转移,并安置大量的外来人口;其次,要在旧都做艰巨的动员工作,以便实现皇室、贵族、官僚以及众多军队与民众的迁徙;最后,要在迁徙的过程中进行组织和协调,实行严密的保安,以防范政变和不测事故的发生,达到顺利迁徙的目的。能够襄助孝文帝完成上述环节的人物,应该是在相应方面既有权威而又有能力者。张彝等人或许具有较强的能力,但当时在朝廷中尚未表现出重大的影响力。

实际上,在北魏政权南迁的过程中,襄助孝文帝完成历史使命的关键人物是尚书李冲、任城王拓跋澄和孝文废皇后冯氏三位。关于李冲和拓跋澄,逯耀东先生已经提及他们在“当时被视为左右手”,作用理应探讨,至于皇后冯氏在迁都事件中的作用,一向并未得到重视,尤其值得提出来研究。

先看李冲的情况。《魏书》卷五三《李冲传》^④记载:“是时循旧,王公重臣皆呼其名,高祖

(孝文帝)常谓冲为中书而不名之。文明太后崩后,高祖居丧,引见待接有加。及议礼仪、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高祖虽自下笔,无不访决焉。冲竭忠奉上,知无不尽,出入忧勤,形于颜色,虽旧臣戚辅,莫能逮之,无不服其明断慎密而归心焉。于是,天下翕然,及殊方听望,咸宗奇之。高祖亦深相杖信,亲敬弥甚,君臣之间,情义莫二。及改置百司,开建五等,以冲参定典式。封荥阳郡开国侯,食邑八百户,拜廷尉卿。寻迁侍中、吏部尚书、咸阳王师。东宫既建,拜太子少傅。”这段记载表明,李冲的威望极高,就连皇帝也不直呼其名;而且权势隆重,朝廷旧臣贵戚无不心服。

《李冲传》还高度颂扬李冲的勤奋和能力,称赞他:“勤志强力,孜孜无怠,旦理文簿,兼营匠制,几案盈积,劊劊在手,终不劳厌也。”特别是,在参与平城的明堂、圆丘、太庙等宏大殿堂的建造时,李冲表现得“机敏有巧思”。所以,孝文帝曾经下诏表彰李冲的出色成就,并且委以兴缮朝廷正殿的大任。该诏书收于《李冲传》中,称道:“成功立事,非委贤莫可;改制规模,非任能莫济。尚书冲器怀渊博,经度明远,可领将作大匠;司空、长乐公亮,可与大匠共监兴缮。”

李冲具有崇高的权威和出色的能力,在北魏朝廷的汉族士族大臣之中能与他在政治地位上相匹敌者极少。

接着谈任城王拓跋澄的情况。《魏书》卷十九中《景穆十二王列传中·任城王云传附任城王澄传》^⑤记载:“高祖时,蠕蠕犯塞,加澄使持节、都督北讨诸军事以讨之。蠕蠕遁走。又以氐羌反叛,除都督梁益荆三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梁州刺史。……梁州氐帅杨仲显、婆罗、杨卜兄弟及符叱盘等,自以居边地险,世为山獫。澄至州,量彼风俗,诱导怀附。表送婆罗,授仲显循城镇副将,杨卜广业太守,叱盘固道镇副将,自余首帅,各随才而用之,款附者赏,违命加诛。于是仇池帖然,西南款顺。加侍中,赐衣一袭,乘马一匹,以旌其能。后转征东大将军、开府、徐州刺史,甚有声绩。”拓跋澄曾都督北讨诸军事,败走蠕蠕;还曾都督梁益荆三州诸军事,平定氐羌;此后转任徐州刺史,则又“甚有声绩”。

拓跋澄既有军事经历,又有地方政绩,因此被召往朝廷任职,并受到孝文帝的接见。《任城王澄传》又记载:“(拓跋澄)朝于京师,引见于皇信堂。高祖诏澄曰:‘昔郑子产铸刑书,而晋叔向非之。此二人皆是贤士,得失竟谁?’对曰:‘郑国寡弱,摄于强邻,民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铸刑书以示威。虽乖古式,合今权道,随时济世,子产为得。而叔向讥议,示不忘古,可与论道,未可语权。’高祖曰:‘任城当欲为魏之子产也。’澄曰:‘子产道合当时,声流竹素。臣既庸近,何敢庶几?今陛下以四海为家,宣文德以怀天下。但江外尚阻,车书未一,季世之民,易以威伏,难以礼治。愚谓子产之法犹应暂用,大同之后便以道化之。’高祖心方革变,深善其对,笑曰:‘非任城无以识变化之体。朕方创改朝制,当与任城共万世之功耳。’后征为中书令,改授尚书令。”拓跋澄仰慕春秋郑国贤相子产,有志于“随时济世”,这正好符合孝文帝的心思,因为孝文帝“心方革变”,所以才“深善其对”。不久拓跋澄被征为中书令,后来改授尚书令,执掌北魏朝廷行政大权。

由于拓跋澄具有丰富的军事与行政经验,而且位居中枢权要,因此成为北魏宗室大臣和鲜卑贵族之中的佼佼者。

国都的迁徙,除了朝廷即政府机构的转移之外,还包含众多家族与家庭的变迁,其中最庞大、最复杂的是皇室。在封建时代,由于皇室地位的特殊性,它的转移成为国都迁徙的标志。因为宫廷事秘,缺乏史料,以往对于北魏迁都过程中皇室转移的问题很少讨论。本文也只能据零星的史料作一些推测。

《魏书》卷一三《皇后列传·孝文废皇后冯氏传》^⑥记载:“孝文废皇后冯氏,太师(冯)熙之女也。太和十七年,高祖既终丧,太尉元丕等表以长秋未建,六宫无主,请正内位。高祖从之,立后为皇后。”文中的“终丧”,是指文明太皇太后冯氏去世已经三年。这位文明太皇太后在世之际权欲极强,不仅凌驾皇帝之上,亲理朝廷政务;而且专制六宫事务,竭力排除异己^⑦。结果,在她去世之后,孝文帝之上非但没有祖母辈分的太皇太后,而且也没有母辈的太后,更没有来得及确立皇后。

在“六宫无主”的情况下,文明太皇太后之兄冯熙的女儿得以“正内位”,被立为皇后。

《皇后冯氏传》记载:“高祖每遵典礼,后及夫、嫔以下接御皆以次进。”还称孝文帝一度对皇后冯氏“恩遇甚厚”。种种迹象表明,继文明太皇太后之后,新立的皇后冯氏成为北魏六宫的主持者。

迁都事业的襄助者

上节已述,李冲、拓跋澄和皇后冯氏分别是汉族士族、拓跋宗室和皇室中具有权势与能力的代表人物。以下所述,北魏国都南迁的实践证明,孝文帝选择他们三位为迁都事业的襄助者是恰当的。

先看李冲在北魏国都南迁中的作用。前节所引《李冲传》记载:“高祖初谋南迁,恐众心恋旧,乃示为大举,因以胁定群情,外名南伐,其实迁也。旧人怀土,多所不愿,内惮南征,无敢言者,于是定都洛阳。冲言于高祖曰:‘陛下方修周公之制,定鼎成周。然营建六寝,不可游驾待就,兴筑城郭,难以马上营讫。愿暂还北都,令臣下经造,功成事讫,然后备文物之章,和玉璽之响,巡时南徙,轨仪土中。’高祖曰:‘朕将巡省方岳,至邳小停,春始便还,未宜遂不归北。’寻以为镇南将军,侍中、少傅如故,委以营构之任。改封阳平郡开国侯,邑户如先。车驾南伐,以冲兼左仆射,留守洛阳。”由这段记载知道,李冲既是经造新都的建议者,又是营构宫室的主持者。

李冲建议经造新都的时间是孝文帝刚刚定计南迁之际,此事在《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也有相应的记载。该纪太和十七年冬十月条^⑧称:“戊寅朔,幸金墉城。诏征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从这条记载知道,与李冲共同从事“经始洛京”者,还有穆亮与董爵二人,而且穆亮的名次出现在李冲之前。

穆亮出身于显赫的鲜卑贵族穆氏家族,在孝文帝之父献文帝时起家为侍御中散,后尚中山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封赵郡王,加侍中、征南大将军。文明太皇太后冯氏临朝听政,穆亮官至司空,参议律令,孝文帝亲政以后,穆亮也备受重用。《魏书》卷二七《穆崇传附穆亮传》记载:“及车驾南迁,迁武卫大将军,以本官董摄中军事。高祖南

伐,以亮录尚书事,留镇洛阳。”^⑨北魏王朝是拓跋部族建立的政权,经造新都则是国家大事,朝廷必然要派鲜卑贵族参与领导,以监督工程的进展。穆亮受诏“经始洛京”,正是作为这样的鲜卑贵族代表,因而他在经造新都中的作用侧重于督察方面。所以,虽然因族别与职位的关系穆亮的名次排在李冲之前,但是并不影响我们对于“营构之任”是由李冲主持的判断。

至于《资治通鉴》中的“董尔”,胡三省注曰:“《北史》作董爵。”在《北史》卷三《魏本纪第三》太和十七年十月条下^⑩,与《资治通鉴》相对应的部分中,“董尔”确实作“董爵”,这也与《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太和十七年冬十月条记作“董爵”是一致的。但是,《北史》卷九〇《艺术列传下·蒋少游传》记载:“少游又为太极立模范,与董尔、王遇等参建之,皆未成而卒。”^⑪则知《北史》并非没有董尔其人。而《魏书》卷九一《术艺列传·蒋少游传》^⑫中也有相同的记载,即同样出现了名董尔者,这当然是因为《魏书》的《蒋少游传》抄录自《北史》的《蒋少游传》的缘故。对此宋人已经指明,中华书局本《魏书》卷九一【校勘记】之[一]^⑬写道:“诸本目录注‘不全’,卷末有宋人校语云:‘此卷,王显以前魏收旧书,崔彧、蒋少游传全出《北史》及《小史》……’”董爵官为将作大匠,而董尔则具有与蒋少游、王遇等参建太极殿的经历,董爵的职官与董尔的职事是相一致的;而且,《资治通鉴》及胡三省注,与《北史》、《魏书》的纪和传,都能够互相参证:这就令人难免猜测董尔与董爵可能是同一人。董尔也好,董爵也罢,虽然作为参与洛阳营构宫室的重要角色,但是其地位与作用肯定低于李冲。这不仅可以从前引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十月诏令中李冲排名在前看出,而且也可以根据《李冲传》中记载李冲在董尔或董爵之前就已经领将作大匠之职得证。

值得思考的是,对于孝文帝迁都的计划,李冲在事先却并不知情。《李冲传》记载:“高祖初谋南迁,恐众心恋旧,乃示为大举,因以胁定群情,外名南伐,其实迁也。旧人怀土,多所不愿,内惮南征,无敢言者,于是定都洛阳。”原来,孝文帝密谋迁都之计后,担心旧人不愿支持,于是假称南伐以

“胁定群情”,从而达到了迁都的目的。此处所谓旧人,实系长期追随文明太皇太后冯氏的朝廷众臣。由于孝文帝接手北魏政权为时甚短,尚未培养成支持自己的新势力,北魏朝廷中旧人尚占据多数,对孝文帝推行迁都新政形成很大的压力。

从《李冲传》中所述当时的情景,不难知道李冲也是属于被“胁定”的旧人。该传记载:“车驾南伐,加冲辅国大将军,统众翼从。自发都至于洛阳,霖雨不霁,仍诏六军发軫。高祖戎服执鞭,御马而出,群臣启颡于马首之前。高祖曰:‘长驱之谋,庙算已定,今大军将进,公等更欲何云?’冲进曰:‘臣等不能折冲帷幄,坐制四海,而令南有窃号之渠,实臣等之咎。陛下以文轨未一,亲劳圣驾,臣等诚思亡躯尽命,效死戎行。然自离都淫雨,士马困弊,前路尚遥,水潦方甚。且伊洛境内,小水犹尚致难,况长江浩汗,越在南境。若营舟楫,必须停滞,师老粮乏,进退为难,矜丧反旆,于义为允。’高祖曰:‘一同之意,前已具论。卿等正以水雨为难,然天时颇亦可知。何者?夏既炎旱,秋故雨多,玄冬之初,必当开爽。比后十月间,若雨犹不已,此乃天也,脱于此而晴,行则无害。古不伐丧,谓诸侯同轨之国,非王者统一之文。已至于此,何容停驾。’冲又进曰:‘今者之举,天下所不愿,唯陛下欲之。汉文言:‘吾独乘千里马,竟何至也?’臣有意而无其辞,敢以死请!’高祖大怒曰:‘方欲经营宇宙,一同区域,而卿等儒生屡疑大计,斧钺有常,卿勿复言!’策马将出。”孝帝假称南伐,李冲却误以为真;孝文帝执意南下,李冲竟坚持异议;孝文帝以“斧钺有常”相威胁,李冲但以“敢以死请”相违抗。体会两人的这段对话可知,李冲虽然身为“统众翼从”的辅国大将军,然而他在事发之前并不知道孝文帝的南迁计划,而且事发之时也未能领会出孝文帝定都洛阳的用意。不过,事发之后,李冲尚能及时转舵,向孝文帝积极呈献营造新都之策,遂能继续得到重用,成为襄助孝文帝南迁的关键人物之一。

接着考察拓跋澄在迁都前后的表现。前节所引《任城王澄传》记载:“后高祖外示南讨,意在谋迁,斋于明堂左个,诏太常卿王湛,亲令龟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高祖曰:‘此是汤武革

命，顺天应人之卦也。’群臣莫敢言。澄进曰：‘《易》言革者，更也。将欲应天顺人，革君臣之命，汤武得之为吉。陛下帝有天下，重光累叶。今曰卜征，乃可伐叛，不得云革命。此非君人之卦，未可全为吉也。’高祖厉声曰：‘《象》云“大人虎变”，何言不吉也。’澄曰：‘陛下龙兴既久，岂可方同虎变。’高祖勃然作色曰：‘社稷我社稷，任城而欲沮众也。’澄曰：‘社稷诚知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之臣子，豫参顾问，敢尽愚衷。’高祖既锐意必行，恶澄此对，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亦复何伤。’”起初，孝文帝为了达到迁都的目的，而故作南讨的姿态；为了争取群臣支持南讨，而用龟卜的方法加以诱导。但是，拓跋澄竟然在“群臣莫敢言”的情况下当面顶撞孝文帝，激烈地反对南讨，致使孝文帝“易筮南伐”的计谋受挫。这正说明，拓跋澄事先对迁都计策毫不知情。其实这也不奇怪，因为拓跋澄原也属于旧人之列。

不过，为时不久拓跋澄的态度就根本改变了。《任城王澄传》接着记载：“车驾还宫，便召澄，未及升阶，遥谓曰：‘向者之《革卦》，今更欲论之。明堂之忿，惧众人竞言，阻我大计，故厉色怖文武耳，想解朕意也。’乃独谓澄曰：‘今日之行，诚知不易。但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崑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任城意以为何如？’澄曰：‘伊洛中区，均天下所据，陛下制御华夏，辑平九服，苍生闻此，应当大庆。’高祖曰：‘北人恋本，忽闻将移，不能不惊扰也。’澄曰：‘此既非常之事，当非常人所知，唯须决之圣怀，此辈亦何能为也。’高祖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加抚军大将军、太子少保，又兼尚书左仆射。”拓跋澄态度的转变，从表面上看，是由于理解了南讨与南迁的关系，而实际上，乃是孝文帝恩威并施的结果。孝文帝对拓跋澄的威胁与利诱之所以能够成功，因为他是皇帝，是封建专制主义集权的体现。

此后，拓跋澄就成为贯彻孝文帝迁都大计的积极动员者。《任城王澄传》又记载：“及驾幸洛阳，定迁都之策。高祖诏曰：‘迁移之旨，必须防众。当遣任城驰驿向代，问彼百司，论择可否。近

日论《革》，今真所谓革也，王其勉之。’既之代都，众闻迁诏，莫不惊骇。澄援引今古，徐以晓之，众乃开服。澄遂南驰还报，会车驾于滑台，高祖大悦曰：‘若非任城，朕事业不得就也。’从幸邺宫，除吏部尚书。”拓跋澄对于南迁事业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向北都平城的旧人作“徐以晓之”的宣传，以利实现皇室、朝廷以及众多军队与民众的迁徙。拓跋澄的工作成效是显著的，不仅受到孝文帝的高度赞扬，而且获得封建官僚体制中最要紧的职位——吏部尚书作为回报。

再来分析皇后冯氏在迁都过程中的作用。前节所引《皇后冯氏传》记载：“车驾南伐，后留京师。高祖又南征，后率六宫迁洛阳。”该传透露，当皇后冯氏率领六宫南下跋涉之际，孝文帝正在从事南征活动。据《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太和十七年条、十八年条、十九年条^④记载：太和十七年九月丁丑孝文帝定迁都之计，十月戊寅诏李冲等经始洛京，癸卯孝文帝幸邺城，乙巳诏安定王休率从官迎家于代京平城；太和十八年闰二月壬申孝文帝至平城宫，癸酉临朝堂部分迁留，三月壬辰孝文帝临太极殿谕在代群臣以迁移之略，十月戊申孝文帝亲告太庙奉迁神主，辛亥车驾发平城宫，十一月己丑车驾至洛阳，十二月辛亥车驾南伐；太和十九年二月壬戌孝文帝下诏班师，五月癸未车驾返回洛阳，八月丁巳金墉宫成，甲子孝文帝引群臣历宴殿堂，九月庚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以上所记，为北魏迁都的整体历程。将此历程与《皇后冯氏传》对照可知：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十月辛亥离开平城宫前往洛阳，自此宫廷事务全由皇后冯氏主持，因此六宫是在冯氏独自组织下开始南迁的；孝文帝于太和十九年二月壬戌班师，五月癸未返回洛阳，此后并未离开洛阳，而皇后冯氏则率领六宫于九月庚午抵达洛阳，因此六宫是在冯氏独自率领下完成南迁的。要之，北魏六宫南迁完全是由皇后冯氏主持实现的。

由于《皇后冯氏传》的记载过于简单，难以探测皇后冯氏对于孝文帝的迁都之计事先是否知晓。皇后冯氏乃文明太皇太后的侄女，显然原属旧人的阵营。迁都之计既然与文明太皇太后生前方略不符，为防冯家获悉消息，孝文帝可能最初也

未向皇后冯氏透露。惜无证据,仅为推测而已。不过,由《皇后冯氏传》的记载知道,皇后冯氏“贞谨有德操”,乃是识大体之人,所以她以实际行动支持了孝文帝的迁都事业。

六宫迁徙,并非简单的过程。《魏书》卷一三《皇后列传·孝文昭皇后高氏传》^⑤记载:“后(皇后高氏)自代如洛阳,暴薨于汲郡之共县。或云昭仪遣人贼后也。”高氏生前地位不高,她的尊号是死后追谥的,但是她是为孝文帝育有二男一女,是曾受皇帝宠爱的宫人。高氏之死,事出有因,被猜测为“昭仪遣人贼后”。这位昭仪也是文明太皇太后之兄冯熙的女儿,倘若猜测正确,则其中必定具有复杂的隐情。但无论如何,高氏死于自代如洛阳的南迁途中,理应属于重大事故。高氏暴薨事件的发生,说明六宫迁徙之途是颇具艰难与危险的,冯氏虽享有皇后之尊,但以一位青年女子当此重任确属不易。

李冲、拓跋澄和皇后冯氏都是孝文帝迁都事业十分得力的襄助者,然而三人事先却并不一定知情,这说明孝文帝对于他们未必充分信任。虽然未必充分信任,但是却要放任使用,其原因是孝文帝欲藉迁都之机以分化旧人。为了理解原委,须先了解北魏迁都的客观原因与孝文帝力主迁都的主观动机。

藉迁都以分化旧人

造成北魏迁都的客观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方面的,也有政治方面的;还有军事方面和文化方面的。迁都问题是王朝的百年大计,诸因素都是执政的孝文帝与其臣僚或私下考虑过或公开讨论过的。

王仲荦先生在专著《魏晋南北朝史》中对于北魏迁都的原因作过集中的表述,该著下册第七章第二节的《迁都洛阳》小节^⑥中称:“……何况自从孝文帝于太和九年(485)扩大推行均田制以后,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已经成为北魏王朝的主要基础,从关外的平城移都到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洛阳,从社会经济发 展的特定阶段来说,也就有其特殊的意义了。孝文帝迁都的原因,此其一。”这是站在社会经济角度作出的分析。为此,

王仲荦先生还引用了孝文帝对成淹说过的一番话作为佐证,“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从山东、河北运粮至平城,不能利用水运),故京邑(平城)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从而指出,“迁都洛阳是解决塞上一带严重粮荒的唯一办法”。^⑦

接着,王仲荦先生谈到了迁都的军事方面原因:“随着封建化程度的加深,拓跋氏内部阶级分化更为急遽,他们的经济逐渐衰颓起来了,这也使得北魏王朝的军事威力逐渐衰落。可是当时居拓跋氏北方的柔然人的势力,却大大扩张起来。……柔然南徙,逼近平城,孝文帝遣数十万骑北拒柔然,‘大寒雪,人马死者众’。如果北魏仍都平城,稍一疏忽,便有被柔然包围的危险,甚至平城有失守的可能;倘南迁洛阳,此时南齐国力,日趋衰颓,不但不能威胁洛阳,而且孝文帝认为如大举南侵,南北混一可期。是平城有累卵之危,洛阳有磐石之安,故定都洛阳。孝文帝迁都的原因,此其二。”可见,以洛阳为都城,既可以避开柔然的锋芒,又有利于向南朝用兵,为实现孝文帝统一中华的宏图奠定基础。

经济与军事方面的因素,与其说是原因,不如说是客观背景更为贴切。其实,在确立新都城的时候,北魏的决策者们考虑得相对多的,应该是政治与文化方面的因素。与旧都平城及其他都市相比,洛阳是传统的政治与文化中心。而此时的孝文帝,在政治上正以统一南北为目标,谋划着向南开拓;在文化上正在与南朝争夺正统地位,欲以华夏文明的继承者自许:所以洛阳才会成为孝文帝向往的圣地。

北魏迁都的原因是综合的,绝非单纯的、偶然的。笔者认为,后世的史学家根据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从大的方面和高的角度去分析北魏迁都的原因,从而考虑到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这无疑是正确的。作为一代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孝文帝对于迁都的前因与后果必然审慎权衡过,他审时度势地作出的迁都决定无疑是伟大的历史创举。但是,对于我们如今在教科书中认识到的,北魏迁都洛阳之举对中华民族融合发生的巨大影响,以及对推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所起的伟大作用,恐怕并不是孝文帝在一千多年前能够

预想到的。我决无贬低孝文帝的历史贡献之意，只是想要说明，北魏迁都洛阳虽然是由多方面客观原因决定的，但孝文帝能够在文明太后去世刚刚满三年就作出义无反顾的决断，则与他个人的情绪具有很大关系。

孝文帝虽然贵为至尊，却长期处在文明太皇太后冯氏的卵翼之下。文明太皇太后曾经两番临朝听政，掌握北魏朝政。《魏书》卷一三《皇后列传·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⑩记载：“及登尊极，省决万机。”又记载道：“自太后临朝专政，高祖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太后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多有不关高祖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即便孝文帝“雅性孝谨”，也曾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况。《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卷末^⑪记载：“文明太后以帝聪圣，后或不利于冯氏，将谋废帝。乃于寒月，单衣闭室，绝食三朝，召咸阳王禧，将立之，元丕、穆泰、李冲固谏，乃止。”文明太皇太后有意要废黜孝文帝，幸亏大臣元丕、穆泰、李冲等人“固谏”，孝文帝的皇位才得以保留。

文明太皇太后既然对孝文帝有过废黜的心思，平时对孝文帝的猜疑就不会少。《魏书》卷五八《杨播传附杨椿传》^⑫记载：杨播归老时对子孙透露，文明太皇太后曾规定宫廷内官每十日必须向她告密一事，“不列便大瞋嫌”，于是众人便在“太后、高祖中间传言构间”；又称，杨播兄弟互相告诫道，处身文明太皇太后与孝文帝“母子间甚难，宜深慎之”；还称，孝文帝亲政之后表扬过杨氏兄弟，因为他们过去没有在文明太皇太后与孝文帝之间搬弄是非。由此可证，文明太后与孝文帝之间的感情是相当微妙而隔膜的。

幸亏孝文帝颇善于运用韬光养晦的谋略，所以往往能够化险为夷，躲过劫难。《高祖纪下》卷末记载：“进食者曾以热羹伤帝手，又曾于食中得虫秽之物，并笑而恕之。宦者先有潜帝于太后。太后大怒，杖帝数十。帝默然而受，不自申明。太后崩后，亦不以介意。”孝文帝不仅能够宽恕进食者的过失，而且竟然不计较进过谗言的宦者。孝文帝虽然年轻，权术与耐心却属不凡。他的韬光养晦之策居然蒙骗了富于阅历的文明太皇太后。

就这样，一直忍耐到文明太皇太后去世，孝文帝才算熬出头，终于结束受制于人的局面。

文明太皇太后的去世，没有引起政治上的波动，北魏的局势相当稳定，原因是文明太皇太后在世时纠集而成的政治集团为时日久，其势力已经根深蒂固。而且，文明太皇太后在生前自作主张，一反随葬先帝于金陵的传统，而将她的陵墓修筑在平城以北仅仅二十公里处的方山顶上。这样的架势，说明她至死也无放弃强势的念头，在百年以后也要居高临下地继续盯着平城政权。要之，文明太皇太后虽然去世，旧人依旧控制和影响着北魏朝廷。

不过，孝文帝绝非任人随意摆布者。在孝文帝的内心深处并不是对以往的遭遇毫不计较的，他对过去所受的虐待“默然而受”和“不以介意”，不过是故作姿态罢了。我们从他对待李冲和拓跋澄这样显赫的大臣都动辄以“斧钺有常”相威胁，不难探出他久久藏于内心深处的凶狠。不过，不管孝文帝心里怎么想，最初在外表上他仍然对文明太皇太后表现得恭敬有加。为了表示这种恭敬的“真切”，孝文帝特意在文明太皇太后陵的侧后为自己修建了规模较为简陋的寿宫，时距文明太后去世十个月。孝文帝修建寿宫，不是给死去的文明太皇太后看，而是给活人看的，尤其要给曾经纠集在文明太皇太后身边的旧人看的。

其实，孝文帝决不甘心情愿地附葬于文明太皇太后之侧，恐怕就在修建寿宫之时他的心中已经在盘算如何摆脱文明太皇太后的阴影了。而彻底摆脱文明太皇太后的旧氛围的最佳办法，莫过于将国都迁离被文明太皇太后死死地盯住的旧都平城。所以，在文明太皇太后去世的第四年，孝文帝就规划迁都了。事实证明，文明太皇太后生前对孝文帝的猜疑不是没有理由的。作为皇帝，孝文帝虽然身份特殊，但也是有血有肉之人，在太和十七年议迁都之计时孝文帝才是虚岁27岁的青年，他的个人情绪难免会成为影响决策的重要因素。所以，为了尽快地摆脱旧的政治氛围，孝文帝迫不及待地作出了迁都的决断。生不能继续忍受后权阴影的笼罩，死不愿葬入文明太皇太后陵侧的寿陵，孝文帝个人的感情因素成为北魏迁都洛

阳的催化剂。

将国都迁往洛阳,肯定违背了在方山之巔死死盯住平城政权的文明太皇太后的意愿,所以迁都之计必然会遭到旧人势力的顽强阻挠。在这样的局面下,孝文帝于太和十七年九月在洛阳施展开假意南伐的策略,从而招致激烈的反对,进而使新旧政治方略的对立公开化。据《李冲传》记载,不仅李冲扬言“敢以死请”,而且“大司马、安定王休,兼左仆射、任城王澄等并殷勤泣谏”。

新旧政治方略的对立,实质正是新旧势力的对立。为了缓和对立,孝文帝采用了“协定群情”的手段。《李冲传》记载了孝文帝晓谕群臣的话语:“今者兴动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苟欲班师,无以垂之千载。朕仰惟远祖,世居幽漠,违众南迁,以享无穷之美,岂其无心,轻遗陵壤。今之君子,宁独有怀?当由天工人代、王业须成故也。若不南銮,即当移都于此,光宅土中,机亦时矣。王公等以为何如?议之所决,不得旋踵,欲迁者左,不欲者右。”通过以南迁替换南伐的戏剧化方法,孝文帝达到了将国都迁离平城的目的。不仅如此,孝文帝还通过让群臣依观点分列左右的方式,迫令他们公开表态。这虽然是具体针对迁都之计的表态,但却是政治立场的亮明,因为迁都之计乃是决定王朝政治前途的关键,高于任何的朝政大事。

这正是孝文帝的高明之处,他以迫令公开表态的政治手段,先将旧人分化开来,以便于逐渐瓦解文明太皇太后长期纠集而成的旧势力。这样的政治手段颇为有效,能迫使一部分人从旧人中分化出来。据《李冲传》记载,前南安王拓跋桢等就站到左方,并颂扬孝文帝为“非常之人乃能非常之事”。但是,仍旧有许多顽固不化者,如安定王休等就公然“相率如右”。

在这样的形势下,进一步分化旧人就显得尤为必要。作为有力的后续手段,便是具体地争取旧人之中既有威望又有能力者。这就是孝文帝以李冲、拓跋澄、皇后冯氏三人襄助迁都的深刻意义。由于孝文帝的恩威并施,李冲等三人积极地主持了相应的迁都事务,成为北魏迁都事业中的关键人物。不仅如此,他们还成了从旧人势力转

化成为支持孝文帝新势力的带头羊。

真是一举两得:分化旧人的手段,推动了迁都之计的实现;迁都之计的实现,进一步分化了旧人。旧人分化的结果,则为组建新的北魏洛阳王朝的政治势力奠定了基础。

- ①参阅拙著《论北魏迁都事件》,收于《北朝研究存稿》,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第 23~41 页。
- ②这三篇文章分别是《导言》、《北魏孝文帝迁都与其家庭悲剧》、《北魏平城对洛阳规建的影响》,收于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一书,(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2000 年版。
- ③逯耀东:《北魏孝文帝迁都与其家庭悲剧》,收于《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2000 年版,第 149~194 页。
- ④[北齐]魏收:《魏书》卷五三《李冲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1974 年版,第 1179~1189 页。
- ⑤《魏书》卷一九中《景穆十二王列传中·任城王云传附任城王澄传》,第 462~480 页。
- ⑥《魏书》卷一三《皇后列传·孝文废皇后冯氏传》,第 332 页。
- ⑦参阅拙著《北魏平城时代》第四章第二节《文明太后临朝听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08~225 页。
- ⑧《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太和十七年冬十月”条,第 173 页。
- ⑨《魏书》卷二七《穆崇传附穆亮传》,第 667~671 页。
- ⑩[唐]李延寿:《北史》卷三《魏本纪第三》“太和十七年十月”条,中华书局标点本 1974 年版,第 110 页。
- ⑪《北史》卷九〇《艺术传下·蒋少游传》,第 2984 页。
- ⑫《魏书》卷九一《艺术传·蒋少游传》,第 1971 页。
- ⑬《魏书》卷九一《艺术传》,中华书局本标点本【校勘记】之一,第 1973 页。
- ⑭《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太和十七年”条、“十八年”条、“十九年”条,第 171~179 页。
- ⑮《魏书》卷一三《皇后列传·孝文昭皇后高氏传》,第 335~336 页。
- ⑯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下册)第七章第二节《迁都洛阳》,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504~506 页。
- ⑰王仲荦先生引用的这段话见于《魏书》卷七九《成淹传》,第 1754 页。
- ⑱《魏书》卷一三《皇后列传·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第 328~330 页。
- ⑲《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第 186 页。
- ⑳《魏书》卷五八《杨播传附杨椿传》,第 1284~1291 页。

作者简介:李凭,1948 年生,历史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

〔责任编辑:潘 清〕